



读兵书 研战策

原典

必死为节，必克为志。

在古往今来的战例中，战斗精神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攻必克，守必坚，踏敌尸骨唱凯旋。没有任何一支萎靡不振的军队可以打胜仗，无精打采的士兵甚至没有

经典战例

1950年12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第50军负责围攻掩护美军撤退的英军第29旅。该旅是英军中公认的佼佼者，曾参加诺曼底登陆，是名将蒙哥马利麾下的王牌部队。战斗中，志愿军战士英勇顽强，不畏生死，提着爆破筒、扛着炸药包，与英军坦克展开一场意志与钢铁的殊死较量。

战例解析

从起义部队到英雄劲旅，战斗精神发挥了关键作用。如何理解、培育和发扬战斗精神，令其在新时代继续焕发强大生命力，是我军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战斗精神的作用是激发战斗力。战斗精神就像催化剂，能够激发出强大的战斗力。例如，秦朝末年的巨鹿之战中，赵国被秦军包围，求救于楚国。项羽率20万楚军救援，迎战秦军30万人马。楚军渡过漳河后，项羽命士兵携带3天干粮，然后凿穿渡船、砸碎锅碗，以此表明有进无退、死战到底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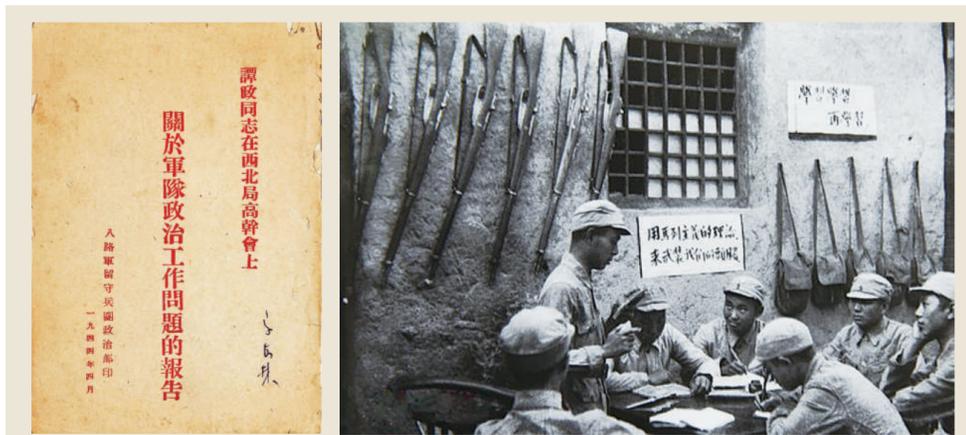
战斗精神的支撑是坚定的信念。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第60军由于缺少信念支撑和思想武装，犹如一盘散沙。加入解放军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这支军队被注入了灵魂，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信仰。



志愿军第50军俘获英军第29旅皇家坦克营部分官兵。

# 永载史册的“谭政报告”

■孙冠楠



左图：1944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印发谭政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右图：晋察冀军区直属部队参加整风学习。

80年前的今天——1944年4月11日，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谭政报告”)。这个报告，产生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的时期，产生在我军政治工作经过长期发展和经验积累的时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反映了政治工作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丰富经验。

集体智慧的理论结晶。“谭政报告”虽以谭政命名，但在报告起草形成过程中，从党的领导人到各级领导干部，很多人都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在报告起草前，毛泽东同志召集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高级干部，专题研究部队政治工作问题。为起草这篇报告，谭政指导政治部秘书处把各部队的整风总结收集起来，整理编写一年来部队关于整风学习运动、拥政爱民运动、开荒生产运动、练兵运动等多篇资料，供谭政和其他领导参考。

并指示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查修改，同时送给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根据地主要领导征求意见。报告初稿以不同方式多次征求县、团以上数百名干部的意见，进一步充实内容。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并由毛泽东同志作了几次重要修改，报告才最终形成。据谭政回忆，报告中有19段共3000多字，由毛泽东同志撰写，强调把“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作为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目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

谭政曾回忆道：“如果说，我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总政治部、留守兵团起草文稿、撰写的文章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些指导作用的话，应该是有毛泽东同志等人的指导，有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自己只是动手执笔写出来而已。”由此可见，“谭政报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思考与创新。

一脉相承的时代宣言。在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古田会议决议和“谭政报告”都是历史性的文件。这两份文件都与谭政有关。1929年11月，他受毛泽东同志委托，到部队调查研

究，把干部战士反映的问题逐条归纳整理，并写出书面意见，为毛泽东同志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并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作记录。巧合的是，时隔15年，他又成为“谭政报告”的起草人。

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政治建军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为我军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1944年的“谭政报告”，在总结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重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论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并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

从思想脉络看，“谭政报告”在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党组织建设、恰当处理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上，继承了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而在巩固和加强政治工作地位、把准政治工作方向任务、正确对待政治工作传统、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基本原则、创新完善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等方面，“谭政报告”又在古田会议决议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扬。

## “人在信在，完成任务”

——红军时期的赤城县邮政局

■胡遵远 王凤霞 王之龙

在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有一座建于晚清时期的四合院建筑——徐氏祠。90多年前，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在这里设立了赤城县邮政局。自此，邮局担负起发行报刊、传递信件、传递文件的任务，众多邮递员用忠诚和鲜血，为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1929年5月，中共罗麻岭特别区委在金寨西部地区发动立夏节起义(也称商南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创建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

至1930年初，汤家汇已是商城县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中心。在此背景下，商城县邮政局应运而生，开启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色邮政的发展历史。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取得商(城)潢(川)战役胜利，改商城为赤城，商城县邮政局也更名为赤城县邮政局。

赤城县邮政局是苏维埃政府领导的邮政通信机构，担负着鄂豫皖交界地区、苏区、白区邮政通信业务。邮政局下设7个邮政支局，配有邮戳、公章和统一的信布挂袋等，除担负发行报刊、传递信件、传递文件任务外，还要为20多个地下党组织传递信件和情报，对传播革命思想、弘扬先进文化、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推进苏区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赤城县邮政局虽然建在苏区，但对外仍以药店为名，秘密开展邮递工作，所有红军指战员到邮局寄递家书，都要先“买药”、对暗号。传递信件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比如，对于苏区与白区地下党组织之间的信件，一般由交通员经过伪装秘密专送，很多信件都是放在衣服、帽子、鞋子的夹层里，或者搓成很细的纸捻子缠到绳子里进行传递；重要的、特殊的信件除采取秘密方式传递外，还要派武装人员进行护送。



上图：红军战士卢炳银的家书。左图：位于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的赤城县邮政局旧址。

赤城县邮政局局长到工作人员都是红军战士、共产党员。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秉承着“人在信在，完成任务”的信念，为完成特殊使命，作出了巨大牺牲。邮政局的三任局长都被敌军杀害，一大批通信人员在执行任务中英勇献身。

小通信员胡小五就是其中一员。在一次送信过程中，他被敌人拦住。狡猾的敌人发现了胡小五藏在袜底的信件，就用刺刀逼迫他带路去寻找红军队伍。胡小五带着敌人在山里转了一整天，最后在一处悬崖边，趁其不备，抓住一个敌人的皮带，纵身跳下悬崖与其同归于尽。

赤城县邮政局自1930年春建立，到1932年9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主力撤出大别山结束，虽然只存在两年多时间，但用邮政服务保障了苏区工作和红军作战，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红军战士卢炳银通过赤城县邮政局寄转的两封家书，现已成为国家一级

文物(原件目前收藏在安徽省六安市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内)，信封上所盖的赤色邮戳，是全国苏区红色邮政机构留下的唯一印记。

卢炳银18岁时加入六安赤卫队，随后被编入红军队伍，曾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营一连战士、排长等职。1932年5月，苏家埠战役胜利后，卢炳银写信回家报捷：“东征收到空前伟大胜利……革命一天高涨，苏区一天发展，苏区一天巩固。”这封信是5月28日寄出的，寄信单位是“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营一连”，收信地址是“赤城县政府转六安四区十三乡二村交”。这封信就是通过赤城县邮政局第七区、第一区赤色邮政支局收转，最终送到卢炳银家中的。

第一封信发出后不久，卢炳银所在的部队又参加了著名的潢光战役。战斗胜利后，卢炳银写了第二封家书，报告潢光战役的胜利消息，告知父母部队正在南下、进逼武汉。这封信1932年7月2日从湖北红安县境内寄出，收信地址是“带转交红安七里坪转交新集市带交皖

西北道区转交六安四区十三乡二村高岗寺”。当时，红四方面军驻在红安县七里坪，红安县邮政局就设在这里。新集市是鄂豫皖省府所在地。这封信的传递路线大致是从湖北红安寄出，经河南新集和赤城县邮政局收转，最终送到卢炳银的家乡。由此可见，当时鄂豫皖苏区的赤色邮政机构健全、制度严格、手续完备、运行通畅，一名普通战士的家书都能够横跨三省、及时送达。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革命战争年代，形势十分严峻，红军留下的文物不多，红军战士的家书更是罕见。卢炳银的这两封家书，见证了红色邮政事业的发展历史，展现了红军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满腔热血的家国情怀，对我们深入研究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乃至鄂豫皖苏区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 链接历史